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交互效应影响研究

马少晔1 袁源2 陈良华3

（1.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江苏 南京 210019；东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211189；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9；

2.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3.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建立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是民营企业重要的非市场战略，在政商关系深度调整过程中，二者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文章基于2012-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从总体层面、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层面和生命周期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单一的非市场战略对企业创新投入失效，二者的交互效应则产生了积极影响；区分联系方式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通过交互效应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查看动态影响，进一步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只存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衰退期则并不明显。

**关键词：**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政商关系；创新投入

**中图分类号:** F4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马少晔（1984—）女，中通服资讯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东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袁源（1976—），女，中通服资讯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关键技术、移动通信。

陈良华（1963—），男，浙江绍兴人，博士，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MA Shaoye1 YUAN Yuan2

(1.Postdoctoral Centre, China Information Consulting&Designing Institute CO,LTD, Nanjing 210019; Post-doctoral St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School of Business,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2. China Information Consulting&Designing Institute CO,LTD, Nanjing210019,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s an important non-market strategie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How do they affect the innovation strateg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in-depth adjustment of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n gem from 2012 to 2017, this paper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from the level of overall and different political contact ways and life cycle, and finds that:a single non-market strategy fails 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bu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them has a positive impact; after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is differentiated, the political contact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based on dynamic perspective of the enterprises’ life cycle, we can further find that this kind of promoting effect only exists in the growth period and maturity period, but not in the decline period of enterprises.

**Keyword**: political conn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hip; innovation investment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明确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民营企业也是重要的创新力量，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主体。但是，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不少制度约束，集中表现在资源匮乏和能力不足（黄新建，刘苗，2018）。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或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Hartsl，1995）。为了获得这些战略资源，企业会主动实施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战略是两种典型的非市场战略，前者指企业主动寻求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以获取相应的资源支持（冯业栋，宋增基，2019）；后者将利益相关者视为重要资源，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Husted和Allen，2007）。

当前，政商关系在深度调整中，制度变迁对于企业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作用（Peng，2003）。民营企业实施创新战略既需要修炼内功，也需要充分考虑制度环境，实现企业与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从公共政策角度看，这种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王春福，2012）。罗明新（2017）曾指出，寻求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利益交集，在企业实施非市场战略、提升绩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逻辑，本文认为，在当前背景下，主动建立良好政治联系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实现与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而增加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和能力；当然，不同的政治联系方式意味着企业与政府互动模式存在差异，其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影响也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的角度研究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对于创新投入的影响，关注政治联系从无到有的作用，而不考虑政府人员辞职或退休后开办企业的等先天具备联系的情况；第二，将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置于当前政商关系下，关注二者的交互作用[[1]](#footnote-1)，对于充分认识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企业新建政治联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聘用现任或曾在政府部门就职人员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管（官员类），另一种是企业家自身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或担任政协委员（代表委员类），二者背后的动机和与政府互动模式并不相同，检验不同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对创新活动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分三个层面，首先，结合当前背景从总体上梳理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其次，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方式与动机有关，不同的联系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政企互动模式，本文将联系方式区分为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分类讨论两种模式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作用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路径；最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存在不同的创新战略，这将影响到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的经济效果，本文将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分阶段研究交互作用的影响机制。

（一）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既需要充分调动各类内部资源，还需要充分运用各类外部资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高管更加熟悉政府工作流程或者能够更好表达企业诉求，有利于获取政府所掌握的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等资源（余明桂等，2010；王婷、张力，2018）。然而，政治联系的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企业获得资源的同时，也在反哺于政治，提供“公的利益”（蒋大兴，2018）。这种“公的利益”往往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就业、税收、贯彻国家政策等。在新型政商关系下，那些能够产生双向作用的政治联系更加容易实现资源获取功能。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和信息（Porter和Linde，1995），并提升企业声誉（李海芹，张子刚，2010）。声誉机制能够向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传递正面信号，获得政府认同。然而，利益相关者不是单个个体，而是“利益相关者群体”（Maignan和Ferrell，2004），企业在同时处理多个利益相关者关系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冲突，那些能够得到政府认同的企业往往更为容易建立信任、共享和协调机制，从而获得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稀缺性信息和资源。

基于此，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产生的交互作用，使得企业能够构建良好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发挥资源获取功能和信号传递功能，获得企业所需要的创新资源支持，从而对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首先是人力资源，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群体是员工，对员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激励机制，获得员工认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黄新建、刘苗，2018），又能够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得到政府的认可，交互效应所产生的声誉优势可以吸引更多外部创新人才，有利于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第二是政府所掌握的稀缺性创新资源，交互效应有利于使企业获得专项的创新资金、税收优惠、政府补助等资源支持，增加企业创新投入的动力；第三是融资便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Cull 和Xu，2005），交互效应的声誉优势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融资安排（赵丽芳等，2019），缓解创新投资的融资约束问题；第四是知识资源，创新活动需要广泛的知识基础，在获取外部知识过程中，不仅利益相关者本身能够提供知识资源，还可以通过良好的声誉优势找寻到优质的合作伙伴（顾群等，2019），获得知识资源支持。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二）政治联系方式、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

民营企业获得政治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聘用现任或曾在政府部门就职人员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管（官员类），另一类是企业家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或担任政协委员（代表委员类）。将后一种进行细分，通常来讲，三种联系的影响力层级应当是：官员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刘林，2018）。刘雅琦（2016）将政治联系方式区分为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认为后者需要更高的建立成本和维系成本，例如社会责任成本，由此削弱了企业创新投入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2012年以来，特别是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18号文”实质上中断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寻租行为，优化了政商关系，换言之，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单纯依靠聘用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获取资源的政治联系被严格限制，单向政治联系的资源获取作用受到抑制，也就难以通过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产生相应的经济效果。

代表委员类则是体现了双向联系，一方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需要考虑各利益团体的代表性（杜兴强等，2009），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往往那些因社会责任履行而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更易于被公众或政府接受，企业高管被选举为代表委员的概率增加（李姝，谢晓嫣，2014），另一方面，拥有此类政治联系的企业更加受到社会的关注，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增强。

这两种方式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联系动机：工具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前者强调政治联系对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后者强调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Li，2010）。刘海建等（2017）将这两种动机置于制度变迁的情境下，认为随着制度转型发展，政治联系的工具动机在减弱，亲社会行为在增强。官员类政治联系方式偏向于工具动机，即实现工具性利益，如低息贷款、补贴等；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方式虽具有双重属性，但是亲社会动机越来越突出。逻辑上来说，在制度环境逐步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家通过政治联系实现参政议政，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建言建策，这种联系方式已经超越了企业自身的工具性利益，是一种新型的政企联系，可以上升为政治战略，能够履行这种亲社会行为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刘海建等，2017）。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也会对这类企业提出更高的诉求，优化外部监督机制，有助于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共治结构，这种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的良性互动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也会对企业创新战略实施产生促进作用。例如，企业需要兼顾政府、股东、消费者和社会环境利益时，就需要在消耗有限资源的同时提高产品效用，势必要求企业加大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力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假设2-2：官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失效。**

（三）不同生命周期视角下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

从动态角度来看，企业的创新战略、现金流量和融资约束等都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因此，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因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查看这种动态影响，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2]](#footnote-2)三个阶段。

企业的研发投入取决于两个因素，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二者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1）成长期企业具有三个特征：更高资金支出需求（童锦治等，2018）、较强的融资约束（朱永明等，2018）和较高的创新意愿。成长期企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各项经营活动已经步入正轨，但亟需进一步扩大市场，企业融资需求和融资规模相对较高。由于企业处于发展时期，债权人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时，那些建立了政治联系且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形成的良好声誉能够极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解决创新投资能力的问题，同时，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提供的其他外部资源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投资意愿。（2）成熟期企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盈利能力稳定、现金流充裕、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研发活动处于高位（潘海英，胡庆芳，2019）。这一时期企业内部资金支持力度强，外部融资渠道通畅，内外部环境均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但是，经过成长期的积累，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资源和声誉优势同样为企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优良条件，刘文楷等（2017）研究发现，成熟期企业倾向于逐步开展多元化并购。多元化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创新战略，特别是在创新活动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时，因此，这一时期非市场战略对企业创新投入支持力度可能有所减弱。（3）企业进入衰退期后，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下降，内外部融资渠道受阻，企业创新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也明显下降。那些实施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战略的企业会将有限的外部资源应用于多元化投资或并购，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基于这一推断，我们认为两种非市场战略的交互效应对衰退期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有限，甚至企业从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战略获得的外部资源和信息越多，企业进一步减少创新投入转而采取其他的市场战略的可能性越强。根据前文分析，区别联系方式后，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本文进一步假设：

**假设3-1：在成长期，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假设3-2：在成熟期，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假设3-3：在衰退期，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失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选取 2012-2017年创业板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剔除退市、样本严重缺失以及上市时间不足三年的样本。样本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相对于主板企业，创业板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作为代表性中小企业，研究其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创业板企业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创新能力较强，研究其创新活动具有典型意义；第三，十八大以来针对党政官员的强力约束对当前的政商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相关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企业特征、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未来一期创新数据和财务绩效数据的样本期间为2013-2018年。为避免极端值影响，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缩尾（Winsorizing）处理。

样本处理方面，首先，本文的政治联系指企业新建的政治联系，样本筛选中剔除那些先天具有联系，即实际控制人或董事长曾有政府就职经历的企业。之所以先天联系不考虑代表委员类是因为，根据构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代表委员往往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较少出现放弃原有事业而进入新领域的情况，并且，从研究样本看，企业家担任代表委员的时间的确晚于企业任职时间。其次，在检验假设2和假设3时，需将新建政治联系区分为聘请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被选举为代表委员两类，不可避免会出现交叉样本，因此在区分政治联系的实证研究中剔除高度重合的样本。第三，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检验是在假设2和3已经得到检验的情况下，因此，所使用的样本与假设2和假设3样本一致。

（二）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1、基本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采取以下基本回归模型：

（1）

（2）

模型中，*i*代表企业个体，*t*代表年度，和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INV*为研发投入，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即研发强度度量，选取当期和未来一期研发投入作为因变量。本文考察的是政治联系（*Pol*）与社会责任（*Crs\_Emp*和*Crs\_Tax*）的交互项*Pol*◊*Crs\_Emp*和*Pol*◊*Crs\_Tax*系数。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政治联系（*Pol*）的度量方式为：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科级以上[[3]](#footnote-3)），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具备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即认为企业具有政治联系，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rs\_Emp*和*Crs\_Tax*和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关于社会责任的度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计量标准（李姝，谢晓嫣，2014），通常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度量，考虑到相关数据如社会捐赠等存在较大遗漏或对于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难以度量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了就业（*Crs\_Emp*）和税收（*Crs\_Tax*）这两项，分别采取员工人数和税收支出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综合考虑了员工、政府、供应商、股东、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采用综合指标度量社会责任。

*X*代表一系列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资产负债率（*Lev*）、融资可得率（*Loan*）、盈利能力（*Roe*）等，相关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个体和时间的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根据企业注册地划定省份，标准差在省级层面进行聚类。有研究指出，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一种广义上的双重差分估计模型（聂辉华等，2009），能够解决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变的遗漏变量问题和不随个体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

表1变量定义

|  |  |  |
| --- | --- | --- |
| 变量名称 | 变量缩写 | 变量描述 |
| 创新投资 | *INV* | 企业研发支出（开发支出与研发费用合计数）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
| 政治联系 | *Pol* | 如果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科级以上），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政治联系-官员类 | *Pol\_Gov* | 如果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科级以上），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 | *Pol\_Del* | 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社会责任-就业 | *Crs\_Emp* | 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
| 社会责任-税收 | *Crs\_Tax* | 企业税收支出（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收返还）的自然对数。 |
| 企业年龄 | *Age* | 样本年度-企业成立年份，取自然对数。 |
| 资产规模 | *Size* |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董事长与CEO兼任 | *Dual* | 当两者兼任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资产负债率 | *Lev* |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
| 融资可得率 | *Loan* | 企业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 |
| 净资产收益率 | *Roe* | 企业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 |

2、区分联系方式的回归模型

在基本回归的基础上，为了检验不同政治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参考杜兴强等（2009）的研究，本文将政治联系区分为官员类（*Pol\_Gov）*和代表委员类（*Pol\_Del）*，同时放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模型设置如（3）和（4）。

（3）

（4）

本模型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政治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项的系数：*Pol\_Gov*◊*Crs\_Emp、Pol\_ Del*◊*Crs\_Emp、Pol\_Gov*◊*Crs\_Tax、Pol\_ Del*◊*Crs\_Tax*。官员类（*Pol\_Gov*）指如果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科级以上），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代表委员类（*Pol\_Del*）指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社会责任变量和控制变量与模型（1）和（2）一致，估计方法同样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标准差在省级层面进行聚类。

3、生命周期视角的回归模型

在假设2-1和2-2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本文将从生命周期视角进一步检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借鉴王旭（2013）的做法，采用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三个指标打分赋值。具体做法是：首先，按照行业分类，在行业内根据三项指标进行降序打分赋值，前1/3赋值为3，中间1/3赋值为2，后1/3赋值为1，计算出各企业得分；然后，将企业得分进行汇总，再次进行降序排列，前1/3为成长期企业，中间1/3为成熟期企业，后1/3为衰退期企业。采用模型（5）和（6）进行分样本回归。

（5）

（6）

本模型主要关注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Pol\_ Del*◊*Crs\_Em*和*Pol\_ Del*◊*Crs\_Tax*的系数在不同生命周期样本中的变化趋势。相关变量和估计方法与前文一致。

**四、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2012-2017年，创业板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6.85%，中值为5.03%，最大值为35.18%，最小值为0，说明企业间的研发投入存在较大差异。政治联系的企业均值为0.42，说明41.84%的民营企业存在政治联系，其中，22.89%的联系方式为官员类，30.57%的企业则是通过董事长或总经理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方式建立，少数企业存在交叉。社会责任方面，就业规模和税收支出的均值分别为6.87和17.42，标准差为0.84和1.00，显示出这两项社会责任指标在民营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均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中值 | 样本数 |
| *INV* | 0.0685 | 0.0000 | 0.3518 | 0.0582 | 0.0503 | 2280 |
| *Pol* | 0.4184 | 0.0000 | 1.0000 | 0.4933 | 0.0000 | 2280 |
| *Pol\_Gov* | 0.2289 | 0.0000 | 1.0000 | 0.4201 | 0.0000 | 2280 |
| *Pol\_Del* | 0.3057 | 0.0000 | 1.0000 | 0.4607 | 0.0000 | 2280 |
| *Crs\_Emp* | 6.8739 | 5.0562 | 9.1983 | 0.8359 | 6.8501 | 2280 |
| *Crs\_Tax* | 17.4107 | 14.2753 | 19.7780 | 1.0037 | 17.4353 | 2144 |
| *Age* | 2.5375 | 1.3863 | 3.2189 | 0.3615 | 2.5649 | 2280 |
| *Size* | 21.2275 | 19.6770 | 23.5284 | 0.7960 | 21.1288 | 2280 |
| *Dual* | 0.4442 | 0.0000 | 1.0000 | 0.4970 | 0.0000 | 2280 |
| *Lev* | 0.2897 | 0.0360 | 0.7265 | 0.1655 | 0.2647 | 2280 |
| *Loan* | 0.0853 | 0.0000 | 0.3777 | 0.0974 | 0.0495 | 2280 |
| *Roe* | 0.0813 | -0.2393 | 0.3062 | 0.0766 | 0.0788 | 2280 |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

政治联系、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控制内生性，因变量选取为当期（*INV*）和未来一期（*INV1*）的创新投入。模型（1）、（2）、（5）、（6）是没有考虑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与创新投入的关系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就表明，在不考虑交互效应的情况下，这两个因素对于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明确。加入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后，无论是就业还是税收社会责任，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假设1得到验证。这就说明，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产生的交互效应的确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展。

其他变量方面，首先，企业规模（*Size*）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这也意味着对于技术水平整体较高的创业板民营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并不相关。其次，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李运鹤（2014）、肖利平（2016）的研究基本一致，我们认为，这与创业板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有关，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决策效率，但由于研发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及极大的不确定性，两职合一对于创新投入的影响取决于高管战略偏好。再次，资产负债率（*Lev*）、融资可得率（*Loan*）和企业年龄（*Age*）均对创新投入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融资约束问题仍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战略的重要因素，同时，相比较于成熟企业，新兴企业更加注重创新投入。最后，企业盈利能力（*Roe*）只对当期创新投入产生抑制作用，而对未来一期创新投入影响不大。

表3 基本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INV*  （1） | *INV1*  （2） | *INV*  （3） | *INV1*  （4） | *INV*  （5） | *INV1*  （6） | *INV*  （7） | *INV1*  （8） |
| *Pol\*Crs\_Emp* |  |  | 0.0054\*\*  (2.29) | 0.0085\*\*  (2.48) |  |  |  |  |
| *Pol\* Crs\_Tax* |  |  |  |  |  |  | 0.0070\*\*\*  (3.78) | 0.0048\*\*  (2.12) |
| *Pol* | -0.0013  （-0.22） | -0.0009  （-0.18） | -0.0386\*\*  (-2.16) | -0.0589\*\*  (-2.51) | 0.0017  （0.29） | 0.0016  （0.29） | -0.1193\*\*\*  (-3.58) | -0.0821\*  (-2.00) |
| *Crs\_Emp* | 0.0032  （0.79） | 0.0010  （0.24） | 0.0017  (0.42) | -0.0015  (-0.37) |  |  |  |  |
| *Crs\_Tax* |  |  |  |  | -0.0067\*\*\*  （-3.40） | -0.0016  （-1.54） | -0.0091\*\*\*  (-3.84) | -0.0033\*\*  (-2.31) |
| *Age* | -0.0481\*\*\* （-4.93） | -0.0256\*  （-1.79） | -0.0473\*\*\*  (-4.88) | -0.0243\*  (-1.83) | -0.0444\*\*\*  （-3.19） | -0.0299\*  （-1.70） | -0.0430\*\*\*  (-3.14) | -0.0289  (-1.68) |
| *Size* | -0.0073\*  （-2.00） | 0.0015  （0.55） | -0.0075\*\*  (-2.11) | 0.0012  (0.47) | -0.0026  （-1.35） | 0.0024  （0.91） | -0.0022  (-1.26) | 0.0026  (1.00) |
| *Dual* | 0.0000  （0.01） | 0.0024  （1.03） | -0.0000  (-0.01) | 0.0023  (1.02) | 0.0009  （0.31） | 0.0027  （1.16） | 0.0010  (0.35) | 0.0028  (1.20) |
| *Lev* | -0.0354\*\*\*  （-3.83） | -0.0407\*\*\*  （-4.48） | -0.0360\*\*\*  (-3.93) | -0.0417\*\*\*  (-4.69) | -0.0322\*\*\*  （-3.48） | -0.0420\*\*\*  （-4.58） | -0.0333\*\*\*  (-3.66) | -0.0427\*\*\*  (-4.83) |
| *Loan* | -0.0187\*\*  （-2.50） | -0.0190\*\*  （-1.81） | -0.0188\*\*\*  (-2.56) | -0.0191\*  (-1.85) | -0.0188\*\*  （-2.59） | -0.0219\*\*  （-2.02） | -0.0181\*\*  (-2.48) | -0.0214\*  (-1.94) |
| *ROE* | -0.1294\*\*\*  （-5.14） | -0.0010  （-0.04） | -0.1294\*\*\*  (-5.10) | -0.0010  (-0.05) | -0.1113\*\*\*  （-3.71） | 0.0014  （0.06） | -0.1104\*\*\*  (-3.67) | 0.0019  (0.09) |
| 常数项 | 0.3471\*\*\*  （4.86） | 0.1084\*  （1.83） | 0.3595\*\*\*  (5.22) | 0.1277\*\*  (2.26) | 0.3717\*\*\*  （5.08） | 0.1367\*  （2.00） | 0.4028\*\*\*  (5.73) | 0.1582\*\*  (2.33) |
| 个体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2280 | 2280 | 2280 | 2280 | 2144 | 2144 | 2144 | 2144 |
| 调整R2 | 0.7963 | 0.7854 | 0.7967 | 0.7864 | 0.7962 | 0.7784 | 0.7978 | 0.7791 |

注：括号内的t值均经过省级层面的Cluster标准误差调整；\*\*\*、\*\*、\*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2、区分政治联系方式的回归结果

本文将政治联系方式区分为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然后在模型中同时纳入两种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检验不同联系方式交互效应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官员类政治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验证了假说2-1和假设2-2。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只存在于代表委员类联系方式，在当前制度背景下，这种联系方式更多体现了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交互效应的实质是协调了政府、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创新发展的相应资源，在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各界认可的同时，也通过互动营造出更加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

表4 区分政治联系方式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INV*  （9） | *INV1*  （10） | *INV*  （11） | *INV1*  （12） |
| *Pol\_Gov \* Crs\_Emp* | -0.0059  (-0.93) | -0.0005  (-0.19) |  |  |
| *Pol\_Del \* Crs\_Emp* | 0.0071\*\*\*  (2.95) | 0.0098\*\*  (2.61) |  |  |
| *Pol\_Gov \* Crs\_Tax* |  |  | 0.0032  (-1.22) | 0.0016  (0.72) |
| *Pol\_Del \* Crs\_Tax* |  |  | 0.0076\*\*\*  (3.76) | 0.0047\*  (1.92) |
| *Pol\_Gov* | 0.0387  (0.78) | 0.0037  (0.18) | 0.0548  (1.07) | 0.3034  (0.73) |
| *Pol\_Del* | -0.0512\*\*\*  (-3.04) | -0.0694\*\*  (-2.67) | -0.1309\*\*\*  (-3.50) | -0.0841\*  (-1.84) |
| *Crs\_Emp* | 0.0017  (0.43) | -0.0016  (-0.40) |  |  |
| *Crs\_Tax* |  |  | -0.0084\*\*\*  (-3.75) | -0.0028\*\*  (-2.00) |
| *Age* | -0.0473\*\*\*  (-4.76) | -0.0251\*  (-1.82) | -0.0420\*\*\*  (-3.04) | -0.0282  (-1.63) |
| *Size* | -0.0076\*\*  (-2.13) | 0.0012  (0.45) | -0.0024  (-1.31) | 0.0025  (0.98) |
| *Dual* | 0.0001  (0.02) | 0.0023  (1.02) | 0.0009  (0.30) | 0.0027  (1.14) |
| *Lev* | -0.0359\*\*\*  (-3.96) | -0.0416\*\*\*  (-4.68) | -0.0337\*\*\*  (-3.67) | -0.0428\*\*\*  (-4.87) |
| *Loan* | -0.0187\*\*  (-2.55) | -0.0190\*  (-1.82) | -0.0178\*\*  (-2.50) | -0.0212\*  (-1.92) |
| *ROE* | -0.1295\*\*\*  (-5.17) | -0.0013  (-0.06) | -0.1106\*\*\*  (-3.71) | 0.0017  (0.08) |
| 常数项 | 0.3636\*\*\*  (5.15) | 0.1314\*\*  (2.25) | 0.4017\*\*\*  (5.72) | 0.1546\*\*  (2.28) |
| 个体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2056 | 2056 | 1960 | 1960 |
| 调整R2 | 0.7968 | 0.7864 | 0.798 | 0.7789 |

3、不同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

将样本企业按照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后，分样本检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影响的动态变化，结果如表5所示[[4]](#footnote-4)。可以看出，随着生命周期的递进，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在依次减弱。交互效应的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期最为显著；在成熟期仍然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仅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入衰退期后，促进作用失效，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假说3-1、3-2和3-3得到验证。

表5 不同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成长期 | | 成熟期 | | 衰退期 | |
| *INV*  （13） | *INV*  （14） | *INV*  （15） | *INV*  （16） | *INV*  （17） | *INV*  （18） |
| *Pol\_Del \* Crs\_Emp* | 0.0091\*\*\*  (5.11) |  | 0.0158\*  (1.76) |  | -0.0131  (-1.07) |  |
| *Pol\_Del \* Crs\_Tax* |  | 0.0099\*\*\*  (4.06) |  | 0.0097\*  (1.89) |  | 0.0006  (0.12) |
| *Pol\_Del* | -0.0620\*\*\*  (-5.05) | -0.1630\*\*\*  (-3.77) | -0.1183\*  (-1.74) | -0.1721\*  (-1.81) | 0.0861 (1.21) |  |
| *Crs\_Emp* | 0.0006  (0.14) |  | 0.0003  (0.05) |  | 0.0092  (1.11) |  |
| *Crs\_Tax* |  | -0.0070\*\*  （-2.64） |  | -0.0102\*\*  (-2.66) |  | -0.0100\*\* (-2.46) |
| *Age* | -0.0228  (-0.77) | -0.0303  (-0.86) | -0.0416  (-1.60) | -0.0417\*  (-2.04) | -0.0780\*\*  (-2.77) | -0.0648\*\*  (-2.60) |
| *Size* | -0.0114\*\*  (-2.78) | -0.0078\*\*  (-2.63) | 0.0017  (0.27) | 0.0081  (1.17) | -0.0087 (-0.64) | -0.0047 (-0.48) |
| *Dual* | -0.0009  (-0.41) | 0.0002  (0.08) | -0.0003  (-0.17) | 0.0010  (0.46) | 0.0022 (0.35) | 0.0008  (0.12) |
| *Lev* | -0.0445\*\*\*  (-4.27) | -0.0420\*\*\*  (-3.33) | -0.0342\*\*  (-2.35) | -0.0349\*\*  (-2.59) | -0.0448 (-1.27) | -0.0290 (-0.87) |
| *Loan* | -0.0160  (-1.29) | -0.0099  (-0.71) | -0. 0311\*\*\*  (-2.83) | -0.0293\*\*  (-2.61) | -0.0149  (-0.98) | -0.0179 (-1.06) |
| *ROE* | -0.1528\*\*\*  (-6.05) | -0.1540  (-4.60) | -0.0638\*\*  (-2.07) | -0.0498  (-1.48) | -0.1613\*\*\*  (-3.92) | -0.1280\*\*\*  (-2.91) |
| 常数项 | 0.3878\*\*\*  (4.25) | 0.4552\*\*\*  (4.65) | 0.1597\*\*  (2.15) | 0.1998\*\*  (2.39) | 0.4186 (1.61) | 0.5291\*\*  (2.12) |
| 个体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时间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样本数 | 674 | 643 | 686 | 660 | 696 | 657 |
| 调整R2 | 0.8195 | 0.8224 | 0.7441 | 0.7262 | 0.8098 | 0.8186 |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因变量创新投入的选择上，同时考虑了当期和未来一期，其中一项作用就是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增强结论的稳定性；同时，在模型估计方法上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也是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变量遗漏，确保了模型估计的相对稳健。此外，本文还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到前文对社会责任履行指标的度量是基于员工和政府角度，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增加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指标，具体做法是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对员工履行的社会责任，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支付作为对供应商、股东和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全部加总后加上各项税费支出减去收到的税收返还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现金支出，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后重新回归，结果证实，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区分政治联系方式后，只有代表委员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项系数显著，支持了前文的估计结果，说明了模型估计的稳健性。第二，在假设4检验时，本文还依据现金流特点重新划分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回归，结论与表5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以创业板民营企业2012-201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研究当前背景下，政治联系、不同联系方式与社会责任履行交互效应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便客观认识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不考虑交互效应的情况下，无论是政治联系还是社会责任履行都对企业创新活动无效，二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优势，发挥资源获取和声誉优势功能，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第二，不同的政治联系方式反应了企业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民营企业家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或担任政协委员的方式是一种企业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模式，具有亲社会动机，其与社会责任履行能够产生良好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企业实施创新战略；单项的、侧重于工具利益动机的官员类联系方式，难以在制度转型发展的情况下实现资源获取功能，也就难以实现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第三，从动态角度来看，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履行的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期最为显著，随着生命周期的递进，这种促进作用逐步减弱，甚至在衰退期出现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意味着，在当前政商关系深度调整过程中，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策略性运用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和社会责任履行这两种非市场战略，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既“利他”，又“利己”，进而实施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金融研究》2009年第11期。

[2]冯业栋、宋增基：《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公司多元化发展——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顾群、王文文、郑杨：《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4]蒋大兴：《政治/政党与企业——政治权力参与资源分配的文明结构》，《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

[5]黄新建、刘苗：《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员工福利与企业业绩——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4期。

[6]李海芹、张子刚：《CSR对企业声誉及顾客忠诚影响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1期。

[7]李姝、谢晓嫣.《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6期。

[8]刘海建、吕秀芹、董育森、张沫：《是否皆为利己——制度转型深入期企业家政治联系的双重角色》，《南开管理评论》，2017年第20期。

[9]刘林：《企业家多重政治联系与企业绩效关系:超可加性、次可加性或不可加性》，《系统管理学报》2018年第3期。

[10]刘文楷、潘爱玲、邱金龙：《企业生命周期、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并购》，《经济经纬》2017年第6期。

[11]刘雅琦、王世权、王凯：《政治关联、创新基金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不同关联方式的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6年第24期。

[12]罗明新：《新型政商关系、企业政治战略与竞争优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7期。

[13]聂辉华、方明月、李涛：《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14]潘海英、胡庆芳：《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融资结构与创新水平互动效应研究——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5]童锦治、刘诗源、林志帆：《财政补贴、生命周期和企业研发创新》，《财政研究》2018年第4期。

[16]王春福：《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

[17]王婷、张力：《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财会通讯》2019年第21期。

[18]王旭：《企业生命周期与债权人治理的“阻尼效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9]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与应用》，《心理学报》2005年第2期。

[20]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21]朱永明、赵程程、赵健、贾明娥：《政府补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11期。

[22]赵丽芳、孙佟、陈素平：《政治关联缓解了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吗?——兼论社会审计的信息增值作用》，《财会通讯》2019年第30期。

[23]Cull,R., L.C.Xu. Institutions,Ownership,and Finance: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7(1).

[24]Hartsl.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4).

[25]Husted, B.W.& Allen, D.B.. Corporate Social Strategy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tecedents and Value Cre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74(4)．

[26]Li,X., X.Liang. A Confucian Social Model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among Chinese Private-Firm Entrepreneur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2).

[27]Maignan,I., Ferrell,O.C..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arket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04,32(1)．

[28]Peng, M.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 28(2).

[29]Porter, M. E., Linde, 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

1. 温忠麟等（2005）指出，调节效应与交互效应不完全一致，调节效应是交互效应的一种。调节效应中，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不能互换；交互效应中，两个自变量可以对称和互换。 [↑](#footnote-ref-1)
2.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创业板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普遍已经度过初创期，因此，只考虑后三个阶段。 [↑](#footnote-ref-2)
3. 有研究将任职限定在处级以上，考虑到创业板的具体情况，本文降低了任职标准。 [↑](#footnote-ref-3)
4. 限于篇幅，假设4的检验仅报告了因变量为当期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 [↑](#footnote-ref-4)